

第一辑 老大中国为何步履沉重

——中国历史的财经解读

一个幽灵缠绕在中国人心头。为什么中国凑巧就没闹成工业革命？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商量好了合伙儿奔向西方？更可悲的是，后来萌芽们东方串种，吱吱喳喳在日本扎了根偏就不扭头瞧一眼中国——结果，西方列强欺辱中国人，日本人更给“同宗同种同文”的中国人一个甲午大败，一个《二十一条》，一个八年旷世劫难。

遥揖千年 你我谁更开心

翻 10 年前的日记，往日依稀昨如梦。看百年前的照片，那就得用沧桑用隔世来形容了。千年前是什么样子？说不清。越说不清的事就越有学问，于是造就了许多史学家国学家，同时也给了许多成不了家的人以饭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工作岗位。如果这工作岗位成百上千地涌来，那就变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了。

人生有限，何不及时行乐？

汤因比好像不是个混饭的先生，大家都认定这位英国史学家做学问地道。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洋和尚怎么说呢？“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汤先生说。

宋朝是公元 960 年建立的，至今千年。汤因比先生何以喜欢宋朝？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很可爱的。开国后，961 年，老赵大宴武将。酒兴正浓，赵叹道：“如果不靠各位的推戴，我不会有今天，但当皇帝也太艰难，并没有当节度使的快乐，每日忧心忡忡，不能安枕。”大家忙问何故，赵正色道：“这把椅子，谁不想坐？”

众骇然，背后凉气直冒。

老赵给大家笑指一条出路：“人生有限，何不及时行乐？各位不妨辞去军职，改任高级文官，置地建宅，搜罗天下歌童舞女，昼夜饮酒取乐。我们世代通婚，上下各安，如何？”

众大喜，隔日纷纷称病解职。

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并不是哪个皇帝都有老赵的胸怀，往往鸟兽尽，走狗烹，国刚立，功臣戮。比如老赵后 400 年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出身低贱颇为自卑，1380 年先杀宰相胡惟庸，屠灭三族，死 30000 余人；1393 年又杀大将蓝玉，15000 人被处死。

胡蓝事件还被写进《逆臣录》里，首页是朱元璋的上方便谕。

去宋朝玩相扑逛夜市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做派是统一的。赵匡胤能不杀功臣，别的方面也很宽容。比如，在宋朝前一个朝代唐朝，它的首都是西安（当时叫长安），那会儿开夜市是有钟点的，到时候一声号令收摊走人。但宋朝的首都开封（当时叫东京）就没有这限制，爱逛多久逛多久——汤因比一定注意到这一点了，一定喜欢这一点的。

按理说宋朝是个挺弱的朝代，虽有岳飞之流鼎鼎大名，但对外老打败仗，皇上还曾被外族掳去，让今人想起来就泪流满面。然而，宋人日子过得好像不错，相扑那阵子玩得正火，后来被日本人学了去；球那会儿也踢得好，踢而优则仕的高俅还做了大大的官（或者反过来说，因为高俅官做大了，所以大家就认定他球也踢得好）。据说大诗人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时，一次出游就可以召集上千妓女——这事确实有碍官员道德形象，但从中可见老赵的宽容和当时经济的兴盛，好像没有市场疲软之类。

宋朝还有许多绝活儿。火药是那阵子发明出来的，罗盘是那会儿攒出来的，活字印刷是那些日子憋出来的，纸币（当时叫交子）也是在宋朝第一个使用的。也有一个不好的绝活儿是那会儿发扬光大的：女子缠小脚——这倒也说明宋朝发达，用不着女人

干活儿，光当花儿摇摆着就行了。

后人，特别是一些日本人和西方人，真把宋朝吹上天了：中国在宋朝展开了一种商业革命和文艺复兴，中国传统社会在宋朝达到顶峰，再往后只是量的堆积而没有质的突破了。

历史学家黄仁宇评价道：“从经济方面讲，宋朝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中国内地与国际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铜钱之流通也创造了新纪录，之后再未为任何朝代所打破。”

积弱的宋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赵姓皇帝们的宽容。

慈禧只看了半部电影

宽容之所以可贵，是相对于执政者的偏狭。比如距今 100 多年的时候，一些新式机器涌进中国，清朝重臣李鸿章的幕僚王炳燮就说：“如果富人得到了新机器，用不了多少时候，就会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王先生是怕两极分化影响安定团结。多亏李老板没听他的，反而闹了些轮船招商局、北洋水师之类。

然而，天下没有纯粹的宽容。宋朝的殿中侍御史黄降就偷偷向上告密：宋用臣那厮以权谋私，强令牛市、马市、果子行、纸行、革行到他开的市场去交易，宋把老百姓的资产装进了自己腰包。

太阳表面也有黑子。经济里什么时候都有腐败。虽贵为人君，也净是不高兴。

1903 年 11 月 16 日是慈禧太后 70 寿辰。这一天，英国驻京参使进献最先进的电影放映机和数套影片。但影片在宫内只放了 3 本，电机就炸裂了。慈禧大怒，认为不祥，清宫内从此就不准放电影了。

今日谁都有可能看一部完整的电影，人们还可以坐飞机玩电脑，可以逛商厦跳蹦极——慈禧不行。但过去一文不值的新鲜空气很难见了，开汽车到处堵堵堵，孩子们已经不会滚铁环了，成年人忙忙叨叨总是烦烦烦。

财富增加了？生活改善了？一晃千年你我谁更开心？

写在新世纪来临之际

范仲淹和钱广手拉手

有钱大家花，有事大家做，这种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古已有之。外有《乌托邦记》内有范氏义庄。

范仲淹写过著名的《岳阳楼记》其“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令许多人顿感高尚。范幼年随母改嫁，日子过得一定有许多不高兴。后官做大了，想起幼时的不高兴，便于 1050 年在家乡苏州吴县建立义庄，用现在的话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范捐 1000 多亩地，用地租赡养同宗族的成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

范仲淹给这个义庄订立章程，规范大家的生活。范氏义庄子孙相传，到本世纪初，已有田 5300 亩。范氏义庄有如下规定：

领口粮 凡是族人，每天可领 1 升（合 1.7598 品脱）白米。仆人儿女在范家服役 15 年且到 50 岁的，也可领口粮。

领衣料 每年冬天每人领绢 1 匹，儿童减半。

领婚嫁费 嫁女领钱 30 贯，第二次出嫁再领 27 贯。娶媳领 20 贯，二次娶媳不能再领了。有点重女轻男？

领丧葬费 按辈分领钱，尊长丧支领 25 贯，次长丧 15 贯，7 岁以下及奴婢均不能领取。

领科举费 赴试可领取 10 贯路费。义庄设有义学，请本族有功名的人教育之。

借住房屋：义庄设义宅，供族人借居，可自行修缮或从义庄领钱修葺，也可在义宅内建房。

借贷族人一时急用，可向义庄告贷。

看来，义庄只是管族人别冻着饿着就行了，有点雷锋的样子，但并不管生产，只管投入不问产出——族人若没田耕种，不能租义庄田地，怕收租子时发生争执，伤了大家和气，同时义庄也买族人的田地，别让一家人丢了饭碗。

这种学雷锋与社会主义正好相反。新中国建立后，政府通过合作化逐渐将土地收归集体，首先在生产体制上和生产方式上也来一场革命，比如办集体食堂。但试了试不行，浪费太大，大家还觉得不好吃，只好作罢。范氏义庄只管生活，社会主义只管生产。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渐渐离开共产主义理念，因为大家认为现在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但也有人喜欢集体的方式，坚持走过去的路，比如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

王洪彬是南街村的党支部书记，1994年他的工资只有250元，没有奖金，没有提成，旁的啥也没有，收入不比一个城里小保姆多。

王洪彬当年42岁，他说除了50年代的合作化，中国农村经历过的一切，我都是亲身推动者。我认为，外地的一些做法至少在南街村是行不通的。60年代搞三自一包，挖一分地多少钱，出一炕烟多少钱，先讲钱再干活，我看那不是社会主义。后来搞联产承包，村里刚刚积累的集体经济砸锅分铁，砖场散伙，农田基建没法搞，群众生活在我们这儿是下降的。

王说：这几年我们把土地又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农业队，还是敲钟出工，其他人搞村办企业，这才有了全国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基地，有了全市第一个亿元村。

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最大的收获是心理得到了平衡。我们这里基本上没有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干群差别，真正是路不

拾遗 夜不闭户，一人有难，千人支援，真像一个共产主义小特区。

一个叫张秋云的女村民说：“我们这钱没啥用，面粉、水、电、煤都免费，逢年过节还有各种副食品，连葱姜胡椒面戏票电影票都是发的。孩子往学校一送，啥都包了，校服厂服都是发的，俺娘家人都说我掉福窝里了。南头新起的大楼，一家一套，里面彩电、冰箱、家具啥都弄好了。村里说了，搬家时啥也不让带，拿着衣被住进去都齐了。”

南街村的中原工贸公司用着 8000 多人，其中 7000 多人是从外边招的。外边来的技术人员，也可能挣着上千元的高薪，虽然王洪彬只挣二百五。南街村人往外边跑项目，吃饭送礼，迎来送往，也是不能少的。村里有一座豪华别墅，全是进口设备，专供村里合资企业的日方老板居住。

百多年前，老外仗着船坚炮利撞开中国大门，当时的中国精英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天，王洪彬的作派也透着这么股劲：计划经济为体，市场经济为用，而老外的资本主义，那不过算是拾遗补缺罢了。

王洪彬的共产主义特区，正在中国市场经济里茁壮成长。要按过去的逻辑可不成，可容不下这么个异类。

整个中国社会都变得宽容了。乌托邦也罢，钱广（电影《青松岭》里老惦记着倒腾小买卖发家的反面典型）也罢，爱谁谁。

写在新世纪来临之际

当官想为民做主

每朝每代都有皇上或政府。要这些家什干什么用？好皇上自然想皇恩浩荡惠泽百姓，好官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坏皇上坏官的话就不说了，免污了纸。

县太爷不许出县城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尤其在近现代之前的长久岁月里，中国的政权力量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传统乡村只靠习俗与伦理来协调，国家很少干预。传统农村的主要关系只是地主和佃农，他们形成了一个一个小团体，国家不大关心。

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秦晖先生不这么看。

2200 年前的秦朝，其国家的权力就实足惊人。虽只有 2000 万人口，却北筑长城发去 40 万人，南守五岭屯兵 50 万人，修建始皇陵和阿房宫各用（也有说共用）70 余万人。还有那工程浩大的驰道网，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这哪里是国家权力只达到县所能实现的？秦汉有乡亭里，北朝有邻里党，北宋王安石有保甲法，这些就是政权基层组织。

600 多年前的明朝，朱姓皇帝大概很想有所作为，很想为民、当然更想为自己做主。于是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并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到处盯着人们的活动，甚至明令县太爷不许出县城溜达。朱皇上的施政方针不是着眼于促进发展，以增加社会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而低效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朱皇上的作派正应了老百姓的话：没有金刚钻，甭揽瓷器活。这也有点像 20 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绑能人的手脚，做这些事时还打着革命的旗号。

历史学家黄仁宇有一段评论：“中国的悲剧乃是在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的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按现在的解释 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机制不健全 偏还要为大家做主，于是只好人治。

这话像是在解释为什么朱姓皇上谨慎和保守。也像是在阐述宋朝宰相王安石之所以不能成功，实在是没个金钢钻，少两把刷子。

戊戌变法是另一个想为民做主却少两把刷子的例子。从 1898 年 6 月 11 日到 9 月 21 日，103 天颁发了 200 多件诏令与批示 宣称要改革政府组织 编制预算 军队现代化 教育向世界转轨 等等。似乎如此一声令下，中国立马现代化。但今人看来，这想法天真大了。

地主率佃农造国家的反

但当政者还是想做事，做大事。秦晖先生说；秦末大乱正是朝廷集中全国大部分人力物力搞基建所引起的，隋末和元末也有类似原因。1900 多年前的新莽王朝实行了非常严厉的“计划经济”，尽其所能集中全国财力 虽只有 14 年的国龄 到其别世时 仅集中在王莽宫中的库藏黄金就有 70 万斤之巨，其数量据说与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

72 年前蒋介石进入上海，一边打仗一边压迫着经济为自己服务。这虽然也是当政者干预经济，但那已不是一般的行政干预，而是战争状态下的非理性干预，是行政干预之极端。

秦晖先生进一步发现，传统中国乡村的主要矛盾不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是对着当政者的。历代“农民战争”不仅极少提出土地要求，甚至连抗租减租都没有提出，却经常喊出口号“迎闯王，不纳粮”；“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还有地主率领佃农造国家的反的场面。不信去看看《水浒》。

这当然是一家之说。细想与传统理论也还是有可沟通之处：历代统治者都代表富人的利益。穷人不干了，打身边的富人不如直接找富人的头儿算账更爽——一笑。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国土广大，虽然科技不发达，但国家的干预能力还是直接间接地深入到每个角落，于是角落里的农人也要跳着脚不远万里去找头儿理论。

政府干预多少适度

共产党人也积极干预经济。特别是建国后和大跃进，控制物价、公私合营、人民公社，但中国共产党人与历代统治者不同，他们是想为人民做主，太想做主了，连今天中午做什么饭、吃什么菜、几点开饭、在哪就餐都想替大家做主。

把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和观念自然而然地带入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对开国头两年的混乱局面，快刀斩乱麻还真有作用。但往后，这种战时体制和观念形成了经济制度，得出的结果就不那么经济了。

美国人是很散漫的。走了 160 年的自由经济后，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遇到了全球性经济危机，有点像一个时期的中国，市场萧条，东西卖不出去。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小心翼翼地由国家手段伸向经济，用财政力量修公路建机场解决就业刺激消费。当时许多美国人批评罗斯福先生，竭力捍卫美国经济的自由和散漫。他们认为，这不仅是公民的权利，更是社会发展的最佳方式。

时至今日 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国家的干预力已远远超过罗斯福时代，比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时不时想调理一下股市。但美国政府的干预行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背后有公众和国会盯着，未了还有司法的裁决。

国家干预到底多少适度？30年的经历促使中国人改变道路，国家行政形象日益隐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20年的改革开放令人瞩目——从所谓高级的经济形态向低级形态回归，此路确是前所未有的。

朱镕基掉了 5 斤肉

政府后退了，接下来的担忧就是行政汲取能力的下降。从1978年到1995年 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从近 31% 跌至不到 11%。

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对中国社会有利还是不利？

学者王绍光认为，在以谈判为特征的财政体制中，地方政府以信息优势帮助它在与中央政府为收入分成办法讨价还价时占有有利地位。中国税收管理自下而上分成的做法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力量，地方收入增加远远快于中央收入的增长。

1994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引用苏东坡名言“犯其至难 图其至远”来形容经济改革。他说：“中国经济改革不从难处着手 就不能再前进。”他表示 分税制的要点是中央收中央的税 地方收地方的税 过去中央占 28% 经济改革后 富了一些省份，穷了中央。财税改革目标就是中央占 60% 以帮助穷省份。“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去谈 结果自己掉了 5 斤肉。”

如果财富更多地从中央政府手里转到地方政府而不是公众手里 怎么办？

写在新世纪来临之际

王安石的脑袋如何能拖起他的身子

不论是千年前的宋朝，还是千年后的今天，对于王安石，真个褒贬不一。

惟一让大家统一的感叹是：在那样一个积弱的时代，怎地就能冒出个王安石？怎地王安石的幽灵散而复聚，死而复生，虽死犹生，虽生却又难以让他老人家开怀大笑——直至今日，王安石所遇问题，仍然困扰着今人。

王安石是 1069 年当的宰相。一朝权在手，便把法来变。王安石新政简略可概括为 10 项。

天王老子也不能胡吃海塞滥花，于是要建立预算制度，并且建立了相应机构，王安石亲自督阵，据说一下子每年就替国家节省开支 40%。不知道当时具体执行得如何，预算是不是说突破就突破。王安石硬顶着不让突破，皇上批来条子怎么办？虽不知古，但尚知今：今天的制度健全了许多，有党委、人大、计委、财政、税务诸多部门联合作战，但这预算还不敢说一是一二是二。此其一。

建立政府储备粮食制度，用政府行为调剂丰歉，在各地首府设立专用仓库，丰收时大量收购，歉年就不必让百姓骂娘。今天也有政府粮仓，存在的问题可能也是一样的，如何逮住“粮耗子”？如何减少粮食在计划与市场两个不同体系运转过程中的损耗？此其二。

农民急得揭不开锅的时候多是在青黄不接之际。王安石下令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低于市场的利息，收获之后再还。因为这项

贷款是用田里的青苗作信用保证的，所以被后人称为“青苗法”。如今的各种贷款可就多了，买电脑都可以贷款。只是贷的都是商业银行的钱。但细一想，银行归根结蒂还是政府做的担保，和王安石那会儿也大同小异。此其三。

富人把穷人的田地收入掌中往往不告诉上面，这样就可以少缴税。王安石督阵全国清查土地，结果清出 360 多万亩。王又重新评估土地肥沃贫瘠程度，分等级纳税。千年之后的今天还有人说土地数目不清。此其四。

建立了一叫做“市易务”的机构，专门平抑物价。物价低时由政府购入，物价上涨时抛出。这个“市易务”还兼营银行，百姓用金银绸缎房产作抵押，就可贷到钱。这是一个伟大的设想，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至今都没能做得很好。政府也不愿意全担起来，说是让市场去调节吧。此其五。

王安石还规定全国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有义务为国家服劳役。如果申请免除劳役，必须缴点钱，让政府雇别人来干。这一点现在做得比较好了，除了在部队尽义务，其它都由钱来核算了，比如今早喝了杯水吃了个馒头，就已经给政府交了税了。此其六。

当时宋朝国防军有 80 万人，仅军饷开支就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却不堪一击，肉得很。王安石下令老弱退役，且国防军不再轮调，而是永久戍边。想必王安石的职务不仅是总理，还兼着军委主席。此其七。

弓都锈烂了，如何杀敌？王安石设立军器监，征求新式武器图样，淘汰落后装备。王安石还兼了总装备部部长。此其八。

那时候不叫综合治理或村民委员会，王安石的“保甲法”也是为了更加适应战事——每 10 个家庭组织一个保，每 50 个家庭组织一个大保，每 500 个家庭组织一个都保，守望相助，随时查处违法乱纪之人。一家有两个男孩的，提出一个当保丁（相当于今天的

基干民兵 预备役 ?)农闲时军训。此其九。

自唐朝到王安石的 400 年间 政府考试课目主要有两个 一是作诗作赋 二是对《五经》填空 叫做贴经。王安石认为这些东西没用。于是下令改考议论文，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同时还教授地理学、经济学、史学、法学、医学等——这些学问与现在肯定有许多差异。今天大家也在骂考试不合理，比如语文的咬文嚼字，让大个儿的文学家都胆寒。此其十。

王安石的脑袋高高地拽着他沉重的身子，以及身子下面的土地 如此脖子能不断吗——据说王安石的新法一公布就被群起而攻之，没有一项能确切实施。

比如青苗法。百姓如何申请贷款？政府如何调查其资信状况？谁来提供担保？到期不能还贷怎么办？政府贷款钱从何处来？所有这一切都要落实才好。用今天的话，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黄仁宇先生评论道：“有了今日的历史眼光，我们才能断言要将这帝国之财政商业化，金融之管制方式必须就位。有关汇票、提货单、保险单、共同海损、以船作抵押之借款、冒险借款、股份、打捞权利等等都要经过立法才能执行无碍。更重要的是法律上有关遗产继承、破产、丧失赎回权、假冒、欺骗、监守自盗等之规定也要与商业社会里的流动状态相符，且一切都用金钱统治，这一点才做得通。宋代内陆商业组织之实况与这种要求相去甚远。”

豪情万丈的王安石必败无疑。王安石当了 6 年宰相 终于下台。再过几年新法被废，走了回头路。王安石等 30 多位变法精英被列为奸党，或批或贬，不得快乐。虽多少年后新法又起，却复而再废，屡战屡败是也。

王安石乃一堂·吉诃德，真乃一前无古人的思想伟君子。

写在新世纪来临之际

大跃进为什么豪情万丈

真正豪情万丈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这是怎样一个烂摊子呀！共产党人走进北京城的时候，经过连年战火，中国经济已到崩溃边缘。此时，内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对共产党人抱有敌视和怀疑的富人，外有三心二意的苏联老大哥和合围新中国的西方集团，其后更有耗费国内的朝鲜战争——所有的人 包括共产党人自己 都睁大了眼睛 眼睛里满是问号。

快刀斩乱麻

在大城市里 敌特活动表面化 税收公债受到攻击 劳资关系紧张 人心浮动 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在物价上。在 1949 年 11 月至 1950 年 2 月期间 物价上涨了 1.5 倍以上。政府动手了：整顿税收 发行折实公债（每张公债在兑现时与一定数量的米、面、棉布、煤等实物等值）以紧缩货币流量，紧缩军政公教人员编制和开支以减少赤字，政府控制主要物资以平抑市场物价。

经过几轮反复 到 1950 年 4 月，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物价下降趋势。

国家的经济活动日益纳入政府的掌握之中。从 1953 年 10 月起，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于是，农民生产了粮食但没权力去卖，市民要买粮食只有到国家的粮店。从 1954 年 10 月起，棉布实行凭票供应，同时发放线票、棉絮票。全国按地区每人每年 1.6 丈（合 5.33 米）至 1.9 丈（合 6.33 米）婚丧嫁娶可补助一定数

量的布票。

挟胜者之威，在资源动员能力和行政效率方面，共产党无疑比国民党优秀得多。1928年，国民党政府无力控制地方政府，便正式把农业税下放给各省政府。而共产党在掌权后的6个月内便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集中财政征税的措施，从而提供了打破极度通货膨胀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另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预算制定的分配全国产量的份额最多包括5%到7%而在1952年共产党的份额是24%到1957年更达到30%。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1953年到1957年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成功 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8.9%。气氛热烈。

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

接下来 温度升高了 再升高 再升。

1958年2月，薄一波提出钢铁企业的生产指标是620万吨，比上一年的535万吨提高19%。3个月后中央政治局把指标提高到800万到850万吨。到了8月农业收成的卫星一放再放毛泽东说服大家赞成产钢1070万吨的指标。几个星期后，毛又提出1200万吨的最新指标。

1958年6月在国家计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中正式提出：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

粮食最热情地响应了号召。比如水稻，湖北孝感县长风农业社刚刚创造了早稻亩产15361斤的世界高产纪录，湖南省醴陵县整仙农业社又以15665斤破了纪录，安徽枞阳县高丰农业社的纪录是16227斤，湖北麻城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拿下16260斤。

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